

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

ZHONGGUO LIXUE LUNLI
SIXIANG TONGSHI

元代卷

陈谷嘉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

(元代卷)

陈谷嘉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长沙·

内 容 简 介

元代理学包括它的伦理思想是理学发展的一个历史新阶段。元代版的道统论、心性论的新说和阐发以及更为完备的道德修养途径是元代理学伦理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色。许衡、陈天祥、吴澄、许谦等理学大家在理学伦理思想的继承、创新、普及上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二十四孝》和元曲伦理剧弘扬、普及了儒家人伦道德精神，与理学家对儒家伦理的阐释和构建汇成了元代社会道德教化的大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 元代卷/陈谷嘉著.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20. 12

ISBN 978-7-5667-2138-9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理学—思想史—中国—元代 ②伦理思想—思想史—中国—元代 IV. ①B244 ②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270822 号

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 (元代卷)

ZHONGGUO LIXUE LUNLI SIXIANG TONGSHI (YUANDAI JUAN)

著 者: 陈谷嘉

策划编辑: 王和君

责任编辑: 王和君

印 装: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7-2138-9

定 价: 66.00 元

出 版 人: 李文邦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88822559(营销部), 88821335(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 642536045@qq.com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与营销部联系

前 言

我的人生中虽有一段行政工作经历（主要是担任岳麓书院行政领导工作），但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发表论文 10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9 部。其中，个人独著 11 部，即《岳麓书院名人传》《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儒家伦理哲学》《社会理想志》《中国思想文化论集》《宋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清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张栻评传》《中国文明起源与路径的研究》；与其他学者合著的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国德育思想研究》《湖湘学派源流》《中国书院史资料（上、中、下）》《中国书院辞典》《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纲要》《书院文化论集》。除学术著作之外，出版了记叙个人人生经历的自传《岁月留痕——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

我的学术著作，大部分成书于我退休之前，是在祖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推动下完成的。

1978年7月，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我有幸在北京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会议由胡乔木主持。这是具有学术和政治双重意义的大会，是推动思想解放的大会。在会议推动下，全国掀起了空前的思想解放大潮。我与许多学者一样，受到“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极大鼓舞，从而重新走上了学术研究的征途，结束了达15年之久的封笔，开启了我前半生的创作高潮。

2003年，我67岁退休，进入人生的晚年，夕阳虽好，但近黄昏。虽然年老体衰，但想到20世纪“文革”内乱时期耗去的宝贵时光，心有不甘。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一定要发挥余热。因此，在我晚年出现了学术研究小高潮。出版了《宋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2006年）、《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2010年）、《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2015年）、《清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2019年），对以伦理为本位而支配宋至清四代近千年，在思想文化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理学伦理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特别是填补了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的空白。采取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理学伦理思想研究向度、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思路，梳理、阐述和总结了理学伦理思想不同发展时期的理论体系、学术特质、发展脉络、发展规律、历史影响和价值，旨在挖掘、阐释对今天思想道德建设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因素与启迪意义的道德修养观和修养方法

论。以伦理为本位研究理学（新儒学），这是我多年前立下的心愿。曾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我对恩师侯外庐先生表示，我不想走理学研究的老路，即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立论，把研究框死在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里面，我以为从先秦儒学到宋代实现儒学变革的新儒学即理学，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我想尝试以伦理为本位研究理学，我的想法深得先生的称许。在上述四部断代理学伦理思想史专著中，我始终贯彻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研究主旨和取向。

上述四部理学伦理思想史著作出版后，得到了学界和其他读者朋友的肯定。学者同道和湖南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反映，四部著作是分不同时间出版的，时间跨度较长，有的已经没有库存，不方便读者成套购买和阅读，建议我对原著进行修订，书名改为《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分为宋代卷、元代卷、明代卷和清代卷，集中出版。四卷断代伦理思想史著作既相互独立又有机联系，贯通了理学伦理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建构了宋元明清四代理学伦理思想体系，反映了理学伦理思想的整体发展脉络和发展规律，合起来叫《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建议，我认为有道理，遂采纳之。我对原著的修订主要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修改了一些表述、订正了一些引文错误以及删除了个别内容，如在清代卷，增加了思想家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思想。

另外，《中国文明起源与路径的研究》《张栻评传》《中

国思想文化论集》《岁月留痕——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等都是我晚年完成的，它们与《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一起见证了我晚年学术著述的艰辛与快乐。

值此《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四卷付梓之际，衷心感谢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各位朋友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敬请广大读者对本书进行批评指正。

陈谷嘉

目次

绪论	1
----	---

理学家伦理思想编

概论	17
第一章 元代理学伦理思想体系构成的基本问题及其特征	18
一、元代版道统说	19
二、具有元代理学品性的人性论思想	25
三、以“修身为本”和修养中的“戒惧工夫”	28
第二章 许衡理学伦理思想	36
一、道统与“惟仁与义也”的道学	38
二、《大学直解》的伦理要义	49
三、《中庸直解》的人伦道德本义	72
第三章 陈天祥《四书辨疑》理学伦理思想	85
一、《四书辨疑·论语》理学伦理思想	87
二、《四书辨疑·孟子》理学伦理思想	101
三、《四书辨疑·大学》和《四书辨疑·中庸》理学伦理思想	112
第四章 吴澄理学伦理思想	124
一、天人一体的人伦道德理论系统	125

二、“人人可尧舜可夫子也”的道德实施系统	148
第五章 许谦《读四书丛说》理学伦理思想	160
一、《读〈大学〉丛说》理学伦理思想	162
二、《读〈中庸〉丛说》理学伦理思想	179
三、《读〈孟子〉丛说》理学伦理思想	198

理学伦理普及编

概 论	215
第六章 儒家孝文化高度浓缩的元代《二十四孝》	216
一、《二十四孝》的思想渊源	217
二、《二十四孝》的辑成	225
第七章 把儒家伦理思想推向通俗化和普及化的元曲伦理剧	249
一、褒扬诚信道德的《晋陶母剪发待宾》	251
二、扬善抑恶的《赵氏孤儿大报仇》	261
三、挾伐贪财嗜利的《看钱奴买冤家债主》	276

绪 论

元代理学是否为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如果它是儒学在元代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那么它具有什么样的理论和时代特征呢？我们如何认定元代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呢？对于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的认识并不一致。相当一段时期流行着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认为元代的思想文化除了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以外，理学和儒学根本不值一提，似乎元帝国取代赵宋王朝以后，理学的发展已停滞，元代理学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宋代理学的简单复制，可以不必置论。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元代理学和儒学研究几乎成为空白。有一段时期的中国哲学和思想史著作中，元代是一个空缺；以后大概考虑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不得不提到元代，但都是把此作为附带，或以一节或以一章的篇幅只作历史性的交代。近几年虽然情形已有大的变化，但仍然缺乏系统的研究，元代理学研究即是如此。笔者认为元代思想文化研究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领域。

元朝的创立者和统治集团以弓马之利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元朝在文治方面也作出了贡献。以儒学而论，虽然未像宋代理学家一样，建构一个新的儒学体系，但元代对儒学的发展仍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就是将儒学即理学发展推到了一个通俗化和普及化的历史阶段。如果说宋代理学家对儒学体系的重新建构标志着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那么元代理学家对理学的通俗化和普及化也标志着理学的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似乎历史已

表明，任何一种具有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学说都要经历一个通俗化和普及化的发展阶段。如汉代，儒学统治地位确立以后，紧接着是推行儒学的社会化和普及化，汉代的各级各类学校都把儒学作为主课，小学生、羽林、甲冑之士都要学习儒学。“期门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经》。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众百数。”（《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樊准传》，《后汉书》卷三十二）。班固在《东都赋》中对此描述说：“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既然上舞下歌，蹈德咏仁，那么汉代儒学的普及化和通俗化就可见一斑了。其实佛学发展也如此，佛学发展到禅宗的阶段，可谓是佛学的通俗化和普及化的阶段。众所周知，禅宗既是中国化的佛教，同时也是大众化的佛学。理学发展，同样也要沿袭上述思想史发展的轨迹。理学作为一个完整的新的儒学体系已在宋代确立，它在元代的发展主要不在于理论和概念系统的再创新和突破，而在于如何将书斋理学推及社会，从思想精英中扩散到民众中。只有这样，理学才能显示其生命力，否则，不但不能发展，相反还会陷入停滞。由于种种原因，理学的通俗化和普及化在宋代未能实现，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元代理学家的肩上。

宋亡元兴，为理学走向通俗化和普及化的发展阶段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元代取代宋王朝统治之后，面临着一个以什么思想治理国家的大问题，面临着蒙古族如何与流传几千年的儒学传统融合的大问题。虽然蒙古族居住区有佛教和道教的流传，但若以佛教或道教统治全国思想，在自汉以来确立的“以儒治国”的强大儒学传统面前是完全行不通的。历史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即必须选择儒学作为统治思想。历史表明，元代选择儒学并不是元代立国后才开始的，早在忽必烈夺取汗位时就已进行，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而成为大汗，这显示了儒学的威力。具体言之，在忽必烈的周围聚集了一批颇

通儒学的汉族知识分子，先有儒者张文谦、王鄂等，后有杨惟中、姚枢、郝经、王文统等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为他出谋划策。忽必烈在争夺汗位的十多年间接触和认识了儒学，学会了汉族地区的儒学统治方法，从而有一种不同于守旧的蒙古“国俗派”的新思维。在此思维指导下，忽必烈跳出了蒙古“黄金家族”的小圈子，走上了选择与接受儒学统治的道路。当他成为元帝国最高统治者之时，传承和接续儒学便成为他治理天下的国策。

元帝国确定儒学为统治思想，这是基于历史情势发展的选择，因此，元代理学不可能只是对宋代理学的简单复制，换言之，它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必然在理论上自己独特的道路。元代理学的通俗化和普及化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就是由当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首先，儒学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必须推行和普及全国，涵盖各民族的思想。但要普及化，首要的是把儒学大众化和通俗化，离开了通俗化，所谓将儒学普及全国和各民族生活中势必成为一句空话。元帝国未建立时，在南北对峙的情形下，不可能提出儒学普及化的要求。当时理学的流传仅在南宋社会，北国在金的统治下，理学只是落第俗儒“句读训解”的“章句之学”，影响极小。随着国家的统一，理学北传，打破了理学地域空间的限制，开始在全国传播。但元王朝统治疆域大，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各民族文化思想的涵养也很不一样，特别是长期居住在祖国边陲的少数民族对理学或儒学知之甚少。因此，理学在全国推行和普及的需要，提出了理学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要求，即把思想精英之间流传的理学转变成元代的通俗化和普及化的理学。由此元代转变了理学原来的发展方向。

其次，元代各民族特别是统治者蒙古族与汉族的融合大势提出了理学通俗化的要求。国家的统一，要求各民族的融合，但民族的融

合最重要的是思想文化上的融合。没有这个融合，不可能有国家真正的统一。融合是相互的，一方面要尊重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吸收各民族有益的文化成分，特别是要吸收各民族先进文化的成分。这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对居于统治地位而引领各民族文化融合潮流的蒙古族来说，面临着许多的困难，首先是他们对先进的汉文化知之甚少。众所周知，蒙古民族长期过着游牧生活，世居黑龙江额尔古纳河东南地带，8世纪后在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放牧，经历了漫长的原始氏族社会阶段，他们对中原文化一无所知。蒙古统治集团在对金的战争中，接触到北国儒学的“章句之学”，但对儒家文化很陌生。这就决定了他们接受儒学或理学的起点很低。换言之，元代理学的传播起点必须放低。只有把宋代的精英理学加以通俗化，才有可能适应包括蒙古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的接受水平，才有可能将书斋理学推向社会，普及全国，扩散到各个民族，满足各民族共同建设精神家园的要求和需要。正是上述两个基本的历史条件，促成了元代理学的通俗化和普及化。可以这样说，理学的通俗化和普及化，是元代理学形态所表现的时代和理论的特征。

那么元代是如何将理学即儒学通俗化的呢？如何把理学推向全国和普及社会的呢？归结起来，元代理学家和学者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其一，经学通俗化。儒家经典是理学的根本，是理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经学的通俗化对理学的通俗化具有特殊的意义，经学通俗化本身便体现了理学通俗化。其二，儒家人伦道德学说通俗化成为理学通俗化的突破口。理学虽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但它是以人伦道德为其本位的，因此，将理学或者说儒学通俗化最根本的途径是将儒家人伦道德学说通俗化。纵观元代理学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它是经学和儒家人伦道德学说通俗化和普及化的历史。

首先，元代经学通俗化集中体现在四书的通俗化。宋代理学体系

的建构主要本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即宋代理学家称之为的四书。虽然四书与五经并列，称“四书五经”，为儒家重要的经典，但是理学家特别重视的是四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特别彰显了四书的思想，为其他理学家所推崇。元代所谓传承儒学即为传承理学，从根本上说是传承“四书学”。因此，对四书进行解读，对其意蕴作通俗性的阐发，便成为元代理学研究的大潮。

为了经学的通俗化，元代理学家纷纷致力于对四书的解读。当时流传着众多四书解读本。著名的有许衡的《大学直解》和《中庸直解》、许谦的《读四书丛说》、陈天祥的《四书辨疑》等。元代流传的四书解读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侧重于对文字的梳理和对义理作大众化的解读，这种读本好似我们今天流传的儒家经典辅读本，内容深入浅出，语言大众化，在北国甚为流传，以许衡也包括许谦为代表。另一种类型则是着力于对四书意蕴的梳理和概括，特别是针对以前南北对峙时对四书解读上的争论而引起的思想混乱，作出了归于一统的解读，如吴澄、陈天祥的四书解读本。陈天祥的《四书辨疑》把当时流行的对四书解读的分歧点和疑点分别列出，共计三百余条，作出了考辨和解释，从而具有解惑的作用。这种解读本也可归于经学大众化的辅读本一类。

元代经学通俗化的解读本中，尤以许衡的解读本最为通俗，经学语言变成了大众化的语言，生动易懂，内容深入浅出，颇具可读性，即使与今天流传的四书白话辅读本相比较也毫不逊色，笔者以为如果重新出版，在今天仍可对阅读四书起到辅导的作用。为了说明经学通俗化的表现，现从《大学直解》抽出几条解读的经文以证之。《大学》经文中曾有一段对周文王既是圣君又是贤臣、既是慈父又是孝子的描述。当描述周文王是圣君时，经文曰：“为人君止于仁。”《大学直解》对此解释说：“文王为国君时管着百姓，他件件事都尽得那

仁爱的道理，无一个人不得其所，所以说‘为人君止于仁’。”对描述周文王为贤臣的“为人臣止于敬”经文作出了如下解读：“敬是恭敬，为人臣的道理在于敬。文王为西伯时服事着天子，他件件事都尽得那恭敬的道理，无一些怠忽的意思，所以说‘为人臣止于敬’。”对“为人父止于慈”的解读是：“慈是慈爱，为人父的道理在于慈。文王为人父时，抚养他儿子，教训成就都做个好人，尽得那慈爱的道理，所以说‘为人父止于慈’。”对“为人子止于孝”的解读是：“孝是孝顺，为人子的道理在于孝。文王为人子时服事他父母，早起晚息，念念不忘，尽得那孝顺的道理，所以说‘为人子止于孝’。”对周文王的“与国人交止于信”，许衡也作出了通俗化的解释：“信是诚实，与人交的道理在于信。文王与国人交接时，言语无一虚诈，所行事都件件着实能尽得那信的道理，所以说‘与国人交止于信’。”（以上均引自《鲁斋遗书》卷四，《大学直解》）对经文作通俗化的解读不仅《大学直解》如此，《中庸直解》也如此；不仅许衡如此，许谦的《读四书丛说》亦如此。我们很难想象上述这些引文是元代理学家的语言，是数百年前古人对经书的解说，这些解说好似今天的白话。如此把经学通俗化是元代理学家的创举，不仅突破了汉唐传注儒学和“章句之学”的樊篱，同时在宋代理学家用义理说经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了经学的神秘，将经学研究引向了大众化和通俗化的发展方向。经学通俗化，大大拉近了元代统治集团与儒家经典的认知距离，这对他们推行汉法和传承儒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与经学通俗化同步的是，元代理学家也把儒家人伦道德学说推向了通俗化发展的道路。本来人伦道德学说是儒学的核心与灵魂，宋代理学家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是实现了儒家人伦道德学说的回归。因此，元代传承儒学，在元代理学家看来，最根本的是传承儒家

人伦道德学说，经学通俗化最终必然要引导儒学，特别是儒家人伦道德学说的通俗化。儒家人伦道德学说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涉及诸多方面，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孝”居于儒家伦理体系中最重要地位，因此，把儒家孝文化加以通俗化在元代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思想意义。正是因为如此，元代对“孝”的通俗化特别关注，“孝”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元代理学家对历史上广泛流传的孝行故事进行了搜集，并在此搜集的基础上编辑出《二十四孝》，以此作为进行“孝”教化的活教材。

《二十四孝》是对儒家孝文化的高度浓缩，是对流传久远的孝子典范的汇集和展示，是对中华民族尊老、爱老和敬老传统美德的彰显；除此之外，《二十四孝》还是儒家孝文化在全国的大普及。《二十四孝》具有鲜明的通俗性的特点。

其一，《二十四孝》不是教科书式地对儒家伦理概念和原理的宣示，而是采取了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生动、直观的表现形式。具体地说，创造了“说、诗、图”三位一体的而且民众乐于接受的“孝”的宣教形式。这好似今日的连环画，每一个孝子的孝行事迹，既有故事的叙说，又有诗歌的赞美，还有绘制的画像展示，从多方面和多视角透析出孝文化的应有之义：故事的叙说宣示了孝行的道理和原则，彰显了尊老爱老的规范；诗歌的赞美肯定了伦理的价值，凸显了善和人性的光辉；画像的直观体现了道德典范的具象，树立了无字的道德丰碑。无论是叙说还是诗和画都向人们传递了丰富而深刻的道德信息，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夫农妇也能接受到孝文化的信息，受到孝道德的洗礼。

其二，《二十四孝》因为是流传久远的典型孝子孝行的汇集和展示，所以《二十四孝》本身便是儒家孝文化和儒家伦理通俗化的产物。我们知道，每一个孝子的孝行故事虽然没有伦理原则、概念一类

的理论语言，但凝结了孝文化和儒家人伦精神，体现了儒家伦理的价值，是对儒家伦理真实、真情、真切地说明，最具说服力。因此，《二十四孝》看似是伦理的通俗品，实际上是元代理学具有时代性和理论特性的重要标志，是理学的精品。

其三，《二十四孝》还体现了元代理学普及化的特点。虽然《二十四孝》的二十四个孝子故事只是历史上流传的众多孝子孝行故事中的一小部分，但这些故事极具代表性，不论在时代、社会阶层上，还是在孝子的身份、年龄及其孝行事迹上都极具代表性。从时代上说，孝子分布在各个朝代。传说时代一个，如孝子虞舜；春秋时代五个，如曾参、闵损、仲由、郯子、老莱子；汉代九个，如刘恒、蔡顺、丁兰、董永、江革、黄香、姜诗、郭巨、陆绩等；魏晋五个；南齐一个；唐代一个；宋代两个。各个朝代都有其孝子的代表。从社会阶层上说，各个阶层都有孝子的代表。如有传说中圣贤虞舜这样的孝子，有尊为天子的孝子汉文帝，有四个官居高位的孝子，更有多个贫民孝子。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效法的道德榜样：为官者可找到像朱寿昌“弃官寻母”和黄庭坚“涤亲溺器”一样的道德效法榜样；少年人可从同龄孝子典范陆绩“怀橘遗亲”和黄香“扇枕温衾”等孝行事迹中找到自己行孝的目标；同样，贫民可以从董永“卖身葬父”、孟宗“哭竹生笋”、蔡顺“拾葚异器”等孝行事迹中找到自己崇拜的道德偶像。总之，《二十四孝》极具普遍性，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影响到各种身份的人。它的内容生动具体，表现形式活泼多样，多侧面、多视角地展示了儒家孝文化，标志着理学及其伦理思想进入了通俗化和普及化的历史发展阶段。

元代理学进入到通俗化和普及化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元代社会大量涌现的凝结儒家人伦道德精神的元曲伦理剧也可作为标志。元代由于理学的通俗化和普及化，引发了儒家人伦道德精神向文学领